

从赋魅到祛魅：摩尔诗歌中的“正义”想象与谦逊诗学

苑华美¹

(1.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 本文聚焦玛丽安·摩尔的《盔甲正在瓦解谦逊》与《光辉的幻影》，结合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与荣格人格面具理论，探讨诗中“正义”的赋魅与“谦逊”的祛魅机制。研究指出，玛丽一世与黑太子爱德华的“正义”实为虚假的面具，以“受损”为名实施暴力扩张，扭曲了正义的平等本质。摩尔通过飞蛾、丢勒犀牛与啤酒广告等意象，强调“谦逊”作为自我反思与认知节制的美德，揭露面具虚伪，倡导包容差异的平等秩序。本文认为，摩尔诗歌回应历史中的“正义”滥用，并强调谦逊是防止其异化的重要伦理力量。

关键词: 玛丽安·摩尔；正义；谦逊；人格面具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英语文学纪事与研究” (23&ZD30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50

一、引言

“正义”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伦理范畴，始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被反复审视。从亚里士多德对“平等”与“矫正正义”的哲学界定，到现代社会对正义异化现象的批判，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承载着人类对平等与公正的永恒追求，又容易被权力、欲望等因素裹挟，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玛丽安·摩尔作为20世纪美国重要的现代派诗人，其诗歌以精准的意象与深刻的哲思著称，尤其善于通过日常与历史的交织，反思社会伦理的核心议题。

本文聚焦摩尔的《盔甲正在瓦解谦逊》(“Armor’s Undermining Modesty”, 1950)与《光辉的幻影》(“Apparition of Splendor”, 1952)两首诗歌，探讨其对“正义”赋魅现象的批判与“谦逊”祛魅功能的倡导。这两首诗歌对“正义”的反思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暗含对伦理实践的深刻洞察。研究将以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为哲学基础，解析“正义”的平等本质与“矫正正义”的应有之义；以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为分析工具，揭示诗歌中历史与文本形象所建构的“正义”面具的虚假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摩尔如何通过“飞蛾”、“丢勒犀牛”、“博克啤酒海报”等显性情节，赋予“谦逊”以认知节制与自我反思的伦理意义，使其成为抵御“正义”异化的重要力量。

通过梳理诗歌中的隐性叙事线，本文旨在揭示：当“正义”被建构为保护性的人格面具，当“矫正正义”沦为暴力与压迫的借口，其赋魅的光环便会消解；而谦逊作为一种承认认知局限、包容差异的美德，能够引导人们回归正义的本质——平等、公正与共存。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摩尔诗歌伦理内涵的理解，更为当代社会反思正义的实践路径提供了文学镜像与伦理启示。

二、被赋魅的“正义”

玛丽安·摩尔的《盔甲正在瓦解谦逊》中“英雄们不会列出他们所厌恶的事物”的表述、对“约翰·戴公司”座右铭的引用、对一位陌生骑士的刻画，以及《光辉的幻影》中讨论丢勒的犀牛图的显性情节，构建了一条关于“正义”效用赋魅现象的隐性叙事线，对“正义”被扭曲与滥用的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

从词源学角度看，“正义”意为“公平公正的品质”；从哲学层面而言“正义”是“在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领域中对是非善恶的一种道德认知和价值评判”(金炳华等, 2001: 1950)。作为道德范畴，“正义”既指符合特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也指“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一种原则，即平等对待”(金炳华等, 2001: 1950)。词源学与哲学定义共同指向“平等”这一核心内涵。亚里士多德亦认为，“正义即是合法且公平之物”(Aristotle, 2009: 81)，而“不义之人贪婪无度”(Aristotle, 2009: 81)的论断则暗示了不平等状态的存在——即一方有所失、另一方有所得。针对这种不平等，亚里士多德提出“矫正正义”(rectificatory justice)概念，认为其“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起

作者简介: 苑华美(1998—)，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19-20世纪英美诗歌。

到矫正作用”(Aristotle, 2009: 84), 并指出平等处于多与少之间, 正义则处于损失与收益之间 (Aristotle, 2009: 86-87)。

摩尔《盔甲正在瓦解谦逊》标题中的“盔甲”一词, 暗喻着不平等与不正义的存在。从词源上看, “盔甲”指“铠甲, 战斗中穿戴的防御性装备, 通常也指保护手段”, 其作为保护主体免遭攻击的工具属性, 与正义概念中隐含的“不正义前提”形成呼应, 暗示着收益方的存在, 而这种得失状态的正当性有待审视。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 (Carl Jung) 提出的“人格面具”理论为这一审视提供了视角: “人格面具”是个体适应世界、与世界打交道时所采用的方式, 其防御性特征体现在促使主体融入群体、避免排斥与迫害。而人格面具展现出的特质与主体的真实性格未必相符, 因而具有一定虚假性 (Jung, 1959: 164)。结合这一理论审视诗歌中玛丽一世、黑太子及相关形象所展现的“正义”, 可见其本质是通过构建自身受损局面以实施“矫正正义”的手段——表面为弥补“损失”, 实则通过不正当行为获取更多利益。

《盔甲正在瓦解谦逊》第六节的“非象征性显性情节” (nonsymbolic overt plot) 中, “英雄们不会列出他们所厌恶的事物” (Moore, 1981: 152) 的表述, 与诗歌的“象征性隐性进程” (symbolic covert progression) 形成鲜明互补 (Dan, 2021: 12), 揭示了“正义”人格面具的建构逻辑。诗中相关段落写道: “他们不会让自己妨碍/他们对其他人助益/ (且他人与他们) 相异。尽管玛尔斯是过分的/是防御性的, /英雄不需要写下属性列表来列举/他们所讨厌的” (Moore, 1981: 152)。这里的“英雄”特质被定义为不对“相异”者持有敌意, 更不会通过“罗列厌恶之物”来强化对立。这种特质反衬出一种相反的行为逻辑: 通过构建“厌恶清单”塑造自身的“正义”形象——即把特定群体定义为“威胁”或“不义”的来源, 以此合理化自身的“防御”或“矫正”行为。这种行为的本质是通过制造“受损”假象, 将自身置于“正义”的道德高地, 进而实现对他人的压制或利益的掠夺。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来看, 这种行为的自愿性使其丧失了正义属性, 因为“一个行为是否正义 (或不义), 取决于其是否出于自愿; 因为自愿的行为会受到谴责” (Aristotle, 2009: 93)。当“正义”成为刻意建构的人格面具, 其背后的贪婪与偏私便会逐渐暴露, 最终导致“正义”表象的崩塌。

《光辉的幻影》中对“丢勒的犀牛”的刻画, 进一步深化了对“正义”赋魅现象的反思。该诗第一节明确写道: “因从未被真正了解, /故而带有奇迹色彩, /丢勒的犀牛/即便长着精致的黑白脊背, /也可能同样让我们感到震惊” (Moore, 1981: 158)。标题中的“光辉”一词意为光辉、辉煌, 是卓越或杰出的象征; 与“奇迹”一词共同指向一种因认知局限而被神化的形象特质。丢勒的犀牛木刻创作于 1515 年, 这位德国版画家并未亲眼见过真实的印度犀牛, 仅根据文字描述和匿名草图完成创作, 导致其笔下的犀牛身披坚硬盔甲、脚呈鳞片状、背上有螺旋小角, 与真实犀牛形象存在显著偏差。然而, 这一并不准确的形象却在历史上广泛流传, 成为人们对犀牛的经典认知, 正如摩尔所描述的“带有奇迹色彩” (Moore, 1981: 158)。这一意象恰如被赋魅的“正义”——由于认知的片面性或刻意的建构, “正义”被赋予了光辉的表象, 但其真实性却被遮蔽。摩尔通过这一隐喻暗示, 当“正义”像丢勒的犀牛一样基于片面认知被塑造时, 它便会成为一种“光辉的幻影”, 失去其应有的平等与公正本质。

《盔甲正在瓦解谦逊》第五节对“约翰·戴公司”座右铭的引用, 构成另一条隐性叙事线。诗中引用该公司“起来吧, 因为白天到了” (Moore, 1981: 151) 的座右铭, 结合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语境可窥见深层意涵: 戴作为新教印刷商, 在玛丽一世时期坚持印刷新教文献并遭受迫害, 而玛丽一世的“正义”人格面具恰与其宗教政策相关。玛丽一世早年因宗教改革沦为“私生女”的受损经历, 使其形成保护性人格面具以融入群体, 继位后则以“矫正正义”为名恢复天主教、迫害新教徒。这种将自身与“正义”人格面具等同的行为, 导致了对异见者的压制, 显露出人格面具过度发展后的虚假性与不义性 (Jung, 1959: 164)。摩尔借座右铭的引用, 既指向历史中以正义之名的迫害, 也暗含对“正义”本质的追问。

诗歌对“陌生骑士”的刻画, 从历史维度进一步揭示了“正义”人格面具的虚假性。《盔甲正在瓦解谦逊》第五节写道: “就像那些熟悉的/如今变得陌生的、追寻圣杯的骑士, 他们曾是/古罗马式的公爵。/没有额外的装饰/没有花环和银杖, 盔甲也未镀金/或镶嵌宝石” (Moore, 1981: 151-152)。摩尔在注释中指出, “公爵”指“古罗马式的军队军官或指挥官” (Moore, 1981: 283), 与“追寻圣杯的熟悉骑士”相关联——这些骑士象征着亚瑟王圆桌骑士团的理想形象, 以“仁慈、荣誉、公正”为核心美德, 盔甲“没有任何额外装饰”, 代表着纯粹的正义追求。相比之下, 诗中“陌生的骑士”则装饰着“花环、银杖, 盔甲镀金/或镶嵌宝石” (Moore, 1981: 152), 这一形象指向康沃尔公爵 (Duke of Cornwall) 黑太子爱德华 (the Black Prince), 他“头戴花环、指戴戒指、手持银杖” (Moore, 1981: 283), 外在的华丽装饰与其行为形成鲜明反差。

黑太子爱德华的“陌生感”源自其“骑士”人格面具的虚假性。作为嘉德勋位的创始成员之一, 他本应践行骑士“仁慈”的核心美德——“永不残忍, 对请求宽恕者予以宽恕”, 并凭借这一人格面具赢得民众的尊敬与支持, 顺利融入以骑士精神为核心的社会群体。但历史记载显示, 他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这一美德: 1370 年利摩日战役中, 因前盟友利摩日主教变节, 他下令处决约 3000 名男女老少以示报复, 这场血腥屠杀使其获得“黑太子”的称号,

也彻底暴露了其人格面具的虚假性。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来看,盟友的背叛或许使他陷入某种“受损”处境,但他的报复行为并非“矫正正义”——矫正正义旨在恢复平等,而非以更大的暴力制造新的失衡。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更深刻揭示了这一行为的本质:人格面具的异常发展导致了心理扭曲,使他在“正义”的名义下实施极端暴力(Jung, 1959: 164)。他以“被背叛”为由建构“正义”人格面具,实则通过屠杀宣泄暴力欲望、巩固权力,这种行为使他从民众心中“熟悉的正义骑士”变成了“陌生的施暴者”。摩尔通过对比理想骑士与黑太子的形象,批判了将“正义”异化为暴力工具的行为,警示人们警惕外在装饰下的“正义”假象。

综上,摩尔通过《盔甲正在瓦解谦逊》与《光辉的幻影》中的多重显性情节,构建了一条贯穿历史与文本的隐性叙事线。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为哲学基础,以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入剖析了玛丽一世、黑太子爱德华及相关形象的“正义”实践:当“正义”被建构为保护性的人格面具,当“矫正正义”沦为利益扩张或暴力压制的借口,“正义”的平等本质便会被扭曲,其赋魅的光环也会随之消解。诗歌对“英雄不罗列厌恶之物”的强调、对丢勒犀牛“光辉幻影”的刻画、对约翰·戴座右铭的引用以及对陌生骑士的批判,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真正的正义不应依赖虚假的人格面具,而应回归平等与公正的本质;不应通过制造对立与仇恨实现所谓“矫正”,而应包容差异、促进共存。这种对“正义”本质的深刻反思,既回应了特定历史语境中“正义”被滥用的现实,也为后世理解“正义”的真正内涵提供了启示。

三、谦逊美德祛魅“正义”

摩尔还揭示了谦逊美德的隐性进程,蕴含在叙述者误将飞蛾当作害虫的错觉、对奥斯卡·奥格(Oscar Ogg)《26个字母》(The 26 Letters)的引用、对东方饮料公司(Eastern Beverage Corporation)海报的描述、对犀牛形象的推测,以及对《刺猬、狐狸与苍蝇》(“The Hedgehog, the Fox, and the Flies”)这则寓言的引用的显性情节中。

“谦逊”出现在《盔甲正在瓦解谦逊》的标题和第七节中,摩尔重复:“盔甲正在瓦解谦逊”,并补充道“而非无心的堕落”(Moore, 1981: 152)。诗人展现了“盔甲”、“谦逊”与“堕落”(depravity)之间的关系:盔甲瓦解谦虚,助长堕落,指向“正义”盔甲的虚假性。

从词源上看,“谦逊”意为“不夸张,有自制力”。摩尔在其诗歌《致蜗牛》(“To a Snail”, 1921)中将谦逊视为一种美德,她写道:“谦逊是一种美德”(Moore, 1981: 85)。在其散文《谦逊、专注与热情》(“Humility, Concentration, and Gusto”)中,摩尔揭示了谦逊的认识论意义,谦逊使她意识到:“原创——即做从未有人想过的事——是不可能的”(Moore, 1986: 421)。正如休谟所界定的那样,“谦逊与厚颜无耻和傲慢相对,表达的是对自己判断的怀疑,以及对他人应有的关注和尊重”(Hume, 1983: 69)。可见,“谦逊”作为一种认识论现象,体现为对错误归因的理性节制与自我反思。玛丽一世和黑太子爱德华“正义”人格面具的虚假性,反映出他们缺乏这种自我反思的谦逊,体现在他们对自身利益受损的笃定上。

针对缺乏谦逊所导致的暴力后果,摩尔在《盔甲正在瓦解谦逊》前两节中,通过“叙述者误将飞蛾当作害虫”的显性情节,质疑了玛丽一世和爱德华的正义。“起初我以为有一只毒虫/一定落在我的手腕上”,叙述者产生了安全受到害虫威胁的错觉。然而,这只害虫实际上是一只无害的飞蛾,“几乎像猫头鹰”(Moore, 1981: 151)。实际上,从生物学角度来看,飞蛾和猫头鹰确实有相同的智慧与和平特质。猫头鹰捕猎时更倾向于制定策略而非诉诸暴力。同样,飞蛾也通过信息素吸引雄蛾,而非以攻击的形式繁殖。飞蛾的智慧与和平特质,与害虫的攻击性形成鲜明对比,解构了叙述者的错觉。摩尔对“害虫”这一概念的颠覆,质疑了玛丽一世和爱德华对自身“正义”的笃定。

诗歌引用《26个字母》中“曾经自决/打造过一柄石斧/并且用毛爪削东西”的显性情节强化了这种质疑。该书介绍了字母的演变,“人类早期祖先留下的最古老的遗物是粗糙的石器。他用毛茸茸的爪子握住这些石器,并用它们来敲打和切割”(Ogg, 1948: 6)。石器工具的使用标志着人类与动物的区别,象征着人类文明的诞生。字母和语言的出现则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形成。摩尔“我们错位的/字母表”则暗示着人类文明可能呈现的扭曲与错误,体现了谦逊的必要性。

描述东方饮料公司海报的显性情节,将自我归因错误的存在正常化。第三节“就算是天才的学者们也会迷路/在错误的词源中”(Moore, 1981: 151)。指的是对“博克”(bock)一词的误用,暗示了谦逊的重要性。诗中的“博克啤酒雄鹿”(bock beer buck)表达来源于东部饮料公司的博克啤酒海报。根据第13行“错误的词源学”的提示,“博克啤酒”(bock beer)名称的起源让学者们感到困惑。“博克啤酒”是一种浓烈的深色德国啤酒,“雄鹿”(buck)特指“公山羊”,也是这家公司海报图片中的山羊。在德国文化中,“公山羊”象征着“强壮”,酿酒商将其与啤酒联系起来,以突显啤酒的浓烈特质。然而,“雄鹿”所蕴含的强壮含义与博克啤酒的浓烈特质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一种“错误的词源学”,因为“博克啤酒”的名称并非源于“雄鹿”。博克啤酒起源于艾恩贝克(Einbeck)。德语中,“ein”意为“一个”,“beck”是“becon”的古老形式,与驿站有关,而非与山羊有关。关于词语的误用,摩尔评论道:“有什么比精确更精确?是幻觉”(Moore, 1981: 151),这暗示了谦逊对于准确使用词语的重要性。

谦逊还体现在《光辉的幻影》中叙述者推测犀牛形象的显性情节中。摩尔注意到丢勒所画犀牛背上的“尖状黑点”，进行了各种详细的推测：“丢勒的犀牛/或许会让我们同样吃惊/若是精巧地长着黑白刺/……/像另一只豪猪，或蕨草，/拱曲的白鹭身上的嘴巴/太黑而难以分辨”（Moore, 1981: 158）。“蓟”是一种多毛植物，其叶子形状类似豪猪的刺。“弓起的白鹭”有一个又长又尖的嘴，具有豪猪和蓟的尖刺形状。然而，摩尔用“太黑而难以分辨”收回了对“犀牛背上长有坚硬尖刺状毛发”的推测，体现了她的谦逊美德。“但双排列阵的喷口状的蓟——/据推测是不适宜的——/从未长过一根硬毛”（Moore, 1981: 158）。摩尔意识到，并非所有带刺的东西，如蓟，都是具有威胁性的。尽管蓟长满了尖刺状的苞叶，但它从不主动攻击。同样，摩尔暗示，从木刻中无法确定犀牛背上的是坚硬的刺还是柔软的毛。因此，摩尔提出了另一种假设：“它是否/是某种令人愉快的想象，/长着像纯色绒鸭耳朵般的/扎根在乌黑苔藓上的刺毛”（Moore, 1981: 158），推测犀牛背上的尖状黑点并非像豪猪的刺那样坚硬，而是像绒鸭的羽毛一样柔软。

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中，摩尔通过引用《刺猬、狐狸与苍蝇》寓言的显性情节，进一步弱化了豪猪的威胁。开头的两行：“由豪猪托起的裙裾——/有十一码长属于一个仙女”（Moore, 1981: 158），引自爱尔兰作家奥利弗·戈尔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散文。摩尔在1928年的散文中专门探讨了戈尔德史密斯的创作风格：“他或许将那些奇幻中略显怪诞的形象视为转瞬即逝的轻浮之物——比如那位拖着长达十五码、由豪猪托举的裙摆的仙女，或那只蓝色的猫，它向王子揭示：“你对白老鼠的痴情不过是一场虚构，根本不是真正源自你灵魂的情感。”但戈尔德史密斯笔下的这种邪恶的消逝，总是意味着一种伤害的逆转”（Moore, 1986: 211）。

其中的核心观点是，邪恶的消逝意味着一种伤害的逆转。然而，邪恶的是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具有威胁性的豪猪。然而，戈尔德史密斯用“怪异”来描述驯化豪猪的仙女，解构了仙女传统的正义形象。此刻，豪猪从威胁性的动物变成了仙女的受害者，证实了邪恶的消逝总是对伤害的逆转。摩尔通过戈尔德史密斯的观点暗示，有着尖刺的犀牛——就像豪猪一样，其有害形象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可以逆转的，这预示着以谦逊态度接近真相的重要性。

摩尔不仅瓦解了犀牛和其他带刺动物的攻击性，还通过拉·封丹（La Fontaine）的寓言《刺猬、狐狸与苍蝇》赋予它们保护者的形象。“一排尖刺短过一排尖刺之间，/林立以为防护”（Moore, 1981: 158）出自该寓言，讲述了一只刺猬遇到一只被吸血苍蝇困扰的虚弱狐狸，并试图帮助它。然而，狐狸拒绝了刺猬赶走苍蝇的提议，解释说这些苍蝇已经吸饱了血，如果把它们赶走，会引来另一群贪婪的苍蝇吸干它剩下的血。刺猬不像吸血苍蝇那样落井下石，而是前来救援，这使得刺猬、豪猪和犀牛等带刺动物从攻击者转变为保护者。

除了改变对带刺动物形象的认知外，《刺猬、狐狸与苍蝇》还具有政治隐喻。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到了这则寓言，伊索为一位被判处死刑的平民领袖辩护时声称：“你们不会再受到这个人的伤害了，因为他已经变得富有。如果你们处死他，其他穷人会来偷窃公共财物，并将其挥霍一空”（亚里士多德, 2005: 125）。伊索暗示，自私的政客是一种“必要之恶”，就像“驯化豪猪的仙女”一样，这也暗示了“丢勒的犀牛”是“必要之恶”的产物。“丢勒的犀牛”是基于一只从远东带到里斯本，用于外交目的的印度犀牛，它是人类欲望的受害者。然而，摩尔并不认同伊索关于“必要之恶”的观点：“缅甸州应该欣慰它的动物/不是一个摇摆不定者，而与其/斗争，宁愿让一触即发的硬毛垂下。/肤浅的压迫者，入侵者，/坚持者，你已找到了一个抵抗者”（Moore, 1981: 158-159）。

缅甸州是美洲原住民和皮毛商人的居住地，这不仅暗示着白人对原住民的征服历史，也暗示着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征服历史。摩尔将“必要之恶”的实施者描述为“肤浅的压迫者”，他们入侵土地，并设定以自我为中心的标准。与被迫顺从的原住民和被制成皮毛的动物不同，出现了一个反抗者。在这则寓言中，“必要之恶”由吸血苍蝇实施，狐狸是不反抗的动物，刺猬是选择改变现状的反抗者。带刺的动物从攻击者和保护者转变为反抗者，拒绝“必要之恶”。“必要之恶”违背了谦逊的美德，谦逊强调清醒地认识自己，而非固执己见。由于缺乏谦逊，玛丽一世和黑太子以“必要之恶”的形式实施“矫正正义”，体现在他们将他人置于不公处境的行为中。摩尔贬低压迫者、入侵者和固执己见者的肤浅，以此反对玛丽一世和黑太子实施的暴力“矫正正义”，并赞扬谦逊这一美德。

四、结语

玛丽安·摩尔在《盔甲正在瓦解谦逊》与《光辉的幻影》中，以精妙的意象与深刻的哲思构建了一条贯穿“正义”赋魅与“谦逊”祛魅的隐性叙事线索。通过对诗歌显性情节的细致解析，我们得以窥见：历史与文本中的“正义”实践往往存在双重面相——它既可以是追求平等与公正的伦理理想，也可能被异化为包裹欲望与暴力的人格面具。玛丽一世以“矫正正义”为名的宗教迫害、黑太子爱德华借“骑士美德”实施的血腥报复，乃至诗歌中隐含的对“正义”工具化的批判，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当“正义”脱离平等本质，沦为自我赋魅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对他人的压制与对伦理的背离。

摩尔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批判“正义”的虚假性，更在于为这种批判提供了建设性的伦理方案——谦逊。通过飞蛾的“非害虫”本质、丢勒犀牛的“光辉幻影”、博克啤酒海报的“错误词源”等意象，摩尔赋予谦逊以多重伦理内

涵：它是对认知局限的承认，是对差异存在的包容，更是对自我中心的节制。这种谦逊并非消极的退缩，而是积极的伦理实践——它要求人们警惕“正义”面具的诱惑，拒绝以“矫正”之名行压迫之实，在承认“错位”与“错觉”的必然性中，守护正义的平等本质。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即平等”到荣格的“人格面具”警示，再到摩尔对谦逊美德的倡导，研究最终指向一个永恒的伦理命题：正义的实践不仅需要“善”的追求，更需要对“自我”的审视。摩尔的诗歌告诉我们，真正的正义不应依赖外在的赋魅光环，而应植根于内心的谦逊自觉——承认差异、反思局限、践行包容。这一启示不仅回应了诗歌创作时代的伦理困境，更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价值多元与利益交织的现实中，唯有坚守谦逊的伦理姿态，才能抵御“正义”的异化，守护平等与公正的文明底线。

参考文献：

- [1] 金炳华等. 哲学大辞典(修订本)[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 [2]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M]. David Ross,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 JUNG C. G. The Basic Writings of C. G. Jung[M]. Violet De Laszlo,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59.
- [4] MOORE M. The Complete Poems of Marianne Moore[M].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1.
- [5] DAN S. “Covert Progression” and Dual Narrative Dynamics[J]. Style, 2021: 1-28.
- [6] MOORE M. The Complete Prose of Marianne Moore[M].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6.
- [7] HUME D.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M]. J. B. Schneewind, Ed.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83.
- [8] OGG O. The 26 Letters[M]. California: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48.
- [9] 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M]. 罗念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From Enchantment to Disenchantment: The Imagination of “Justice” and Poetics of Modesty in Moore’s Poetry

Yuan Huamei¹

¹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Marianne Moore’s “Armor’s Undermining Modesty” and “Apparition of Splendor”, analyzing the enchan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disenchantment function of “modesty” through Aristotle’s theory of justice and Jung’s concept of persona. It argues that figures like Mary I and Edward the Black Prince wear false personas of “justice,” using “rectificatory” rhetoric to justify violence and power expansion, thereby distorting justice’s egalitarian essence. Meanwhile, Moore employs images such as moths, Dürer’s rhinoceros, and Bock beer posters to highlight modesty as a virtue of self-reflection and cognitive restraint. This modesty unveils the falseness of performative justice and affirms a just order grounded in equality and tolerance. Ultimately, the poems critique historical abuses of “justice” and advocate modesty as a crucial ethical force resisting its alienation.

Keywords: Marianne Moore; Justice; Modesty; Persona